

大学人文基础

主 编 黄保强

孔子与儒家思想文化
大学之道——人生的起点
『克己复礼』——
用儒家思想构建和谐人生
人之初，性本善
网络时代的道德培养



为人之道——立身之本
中庸之道——处世智慧
上善若水，以柔克刚
荣辱观是现代社会的儒家思想的传承
儒家道德理想与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培养
大学中的现代教育思想
急功近利与浮躁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C/31

2007

大学人文基础

主 编 黄保强
副主编 申立富
编 委 张保明 鄢 云
于晓楠 刘月华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创造的主体,也是社会精神的塑造者。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拥有高尚人格、健康体魄、平和心态的人,是未来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本书旨在通过学习传统儒学的思想、道德、文化,以加强大学生自身的道德基础,增强对社会、对他人、对自然的认知和责任。本书既体现了“大学之道”、“中庸之道”等传统儒家伦理,更突出了新时代的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人文精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人文基础/黄保强主编.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608-3611-9

I. 大… II. 黄… III. 人文科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963 号

大学人文基础

主 编 黄保强

责任编辑 卞玉清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潘向葵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1.25

印 数 1—8 000

字 数 425 000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3611-9/C·174

定 价 3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儒家的经典作品作为大学历史课程已普遍开设,而作为大学语文教学的主要教材还从来没有。我们是在面对社会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导致人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呼唤人文精神,呼唤人类良知,觉醒儒家思想,而编撰了《大学人文基础》这本教材。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创造的主体,也是社会精神的塑造者。提高人的素质,是促进社会发展、家庭和睦的关键。大学生承接着家庭与社会,他们不仅接受了父母的生物遗传,而且从父母那里接受了人生当中第一堂教育课。还是现实和未来、社会和家庭的道德传播者。《大学人文基础》就是旨在通过传统儒家思想、道德、文化的学习和熏陶,加强大学生的自身道德基础的培养,增强对社会、对他人、对自然的认知和责任,使之成为一专多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使之成为拥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健康的体魄、平和的心态的人,使之成为能办事、会做人的人。

《大学人文基础》不同于普通的大学语文,也不是儒家学术的研究,而是以儒家中的四书五经为蓝本,撷众家对儒道等思想、道德、文化的研究成果,结合现代社会,对其进行全新的阐述。全书分十二章,其中第一、八章由黄保强编写,第四、六、九章由申立富编写,第二、十二章由张保明编写,第三章由于晓楠编写,第五、十一章由鄢云编写,第七、十章由刘月华编写。书的重点内容为:人生理想,为人之道,智慧启迪,上善若水,知荣辱慎言行等。每一章都附有导读和思考题,书后附上孔子、孟子、老子的部分原作及儒家修身名句。

《大学人文基础》作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文理实用的公共教材,具有思想性、民族性、科学性、实用性等特点。教材恪守优秀人文传统,立足大学生精神成长,贯穿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这一灵魂。所撰、所选作品中浸透着人的思想、品德、修养、情感、智慧以及社会和自然,体现着人性的真、善、美,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人文精神的内涵。为了使本书结合高职生的知识结构和实际水平,以确立培养目标,我们在编写时力求内容重点突出,程度篇幅适中,既体现高等职业教育教材的高度,又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使学生易学,教师易教。

《大学人文基础》的编撰,是在赣江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大学语文》教研组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得到了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刘亨铭教授的直接关心和指点,我们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我们对参与或帮助过本书编写的老师和朋友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在编撰工作中,难免有疏漏或不足甚至谬误,对此我们表示歉意。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重印时修正。

《大学人文基础》编辑组

2007年6月

目次

前言

第一章 孔子与儒家思想文化	1
第二章 大学之道——人生的起点	7
导语	7
经文再现	7
第一节 大学之道重明德	8
第二节 知纲达目修己身	9
第三节 明德识道净灵魂	10
第四节 天德光炁养人性	12
第五节 五德五炁养命身	13
第六节 仁德亲民众生心	15
第七节 止于至善心明亮	16
第八节 明德慈爱亲新民	18
第九节 八目次第修在心	19
第十节 格之于物而知身	20
第十一节 知善明德煅德性	21
第十二节 修齐治平德为本	23
第三章 为人之道——立身之本	27
导语	27
第一节 诚信立世,前途顺坦	28
第二节 以“仁”做人,孝悌为本	31
第三节 君子有财,施于急困	35
第四节 人之初	37
第五节 治学做人,不可分离	39
第六节 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40
第七节 志存高远,穷当志坚	44
第八节 多师前人,完善自己	48
第九节 不要把人看扁了	49
第十节 谦虚恭敬是美德也是智慧	51

第十一节	公正无私	54
第十二节	慎独修身,静心养性	56
第十三节	莫以小利忘大义	62
第十四节	物欲至上不是交友之道、朋友之道	64
第十五节	广交朋友,从仁、从善、从慎	69
第四章	中庸之道——处世智慧	74
导语		74
第一节	允执其中	76
第二节	过犹不及	83
第三节	和而不同	91
第四节	所贵者权(君子时中)	93
第五章	上善若水,以柔克刚	102
导语		102
第一节	水利万物而不争	103
第二节	至虚极,守静笃	121
第三节	水滴石穿,厚积薄发	125
第六章	“克己复礼”——用儒家思想构建和谐人生	131
导语		131
第一节	自我心灵的克制	132
第二节	自我心态的调节	133
第三节	以“礼”服人	134
第四节	理想在于感受	135
第五节	人生重在起点	136
第七章	荣辱观是现代社会儒家思想的传承	138
导语		138
第一节	荣辱观来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38
第二节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道德根基和重要 精神支柱	139
第三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和超越	146
第四节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当代大学生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 道德建设	148
第八章	儒家道德理想与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培养	150
导语		150
第一节	儒家的修身理论与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	150

第二节	儒家的天下主义与学生正确人生观的确立	152
第三节	儒家的诚信观与诚信思想教育	154
第四节	儒家的入世精神与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培养	155
第九章	人之初,性本善	157
第一节	客观的人性存在	157
第二节	社会主义时期的善恶标准	165
第十章	网络时代的道德培养	174
第一节	网络道德现状	174
第二节	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时代主题	184
第十一章	大学中的现代教育思想	193
第一节	人本意识与人本教育	193
第二节	人本教育的具体实现	199
第三节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的思考意义	204
第十二章	急功近利与浮躁	248
第一节	明辨义与利	248
第二节	公利与私利	251
第三节	急功近利的心理分析	252
第四节	求真务实的大敌	252
第五节	浮躁的心理分析及其特征	255
第六节	浮躁的种种表现	256
第七节	浮躁心理的调适及戒除	260
附录一		262
附录二		284
参考文献		328

第一章 孔子与儒家思想文化

孔子是公元前 551 年诞生于今山东曲阜的尼山。名孔丘，字仲尼，后来人们尊称他为孔子。他的上世原是殷代贵族的后裔，从祖辈起就从宋国迁居鲁国，沦为庶士阶层。他父亲早死，家境贫寒，需要学得一技之长来养家糊口。当时有“儒”这一行业。古时从官到民，婚丧嫁娶和祭神拜祖，都有繁琐的仪式程序，而且礼和乐是不分的，举行这些礼仪，还要具有音乐的知识。这些知识，一般人是难以掌握的，于是就需要懂得礼乐的内行来指导帮助，这种人也叫做“相”。这些人逐渐从生产中脱离出来成了半职业或职业人员。孔子从小就喜欢陈列祭品之类的游戏，他从盲乐师那里学习弹琴唱歌，从礼相（司仪）那里学礼仪，便从事“相”的工作。他好读古书，并努力学习，常常“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后来，他为鲁国的新兴权势家族季氏当委吏，管理粮仓的出纳；又当过司职吏，管理畜牧。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以“好学不厌”的精神，获得了“礼乐射御书数”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成了一个博学多能的人。30 岁左右，他创办私学，传播其思想和知识，创立了儒家学说。同时他还从事一些政治活动，推行其学说和主张，但未得到当权者采纳。51 岁时，他在季氏的提拔下，出仕鲁国朝廷，任中都宰（管理国都），在执政季氏主管下协助做过司空（管理建设工程和建筑）、司寇（治安保卫）的工作，在外交场合中曾“摄相事”（代理过礼宾司）。此间，他还曾以相礼的身份参加齐鲁两国国君的夹谷之会，并使鲁国收复了郛、灌、蒙三座城池。他企图削弱掌权的鲁国三家大夫（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的势力，以提高国君的权威，未能成功，于是辞去官职，离开鲁国，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到过卫、晋、陈、蔡、楚等国，风尘仆仆，历时 14 年。在此期间，他受到过欢迎，也受到过一些国君和贵族的冷遇，被隐者奚落，甚至被人围困，“累累若丧家之犬”，但孔子未尝放弃其学说和主张。

当孔子周游列国，无所成就之时，他的一些弟子在鲁国担任了要职，特别是冉求当了执政者季氏的宰（陪臣），当时鲁君大权旁落，操纵在季氏手中，但季氏的权柄又被其宰所掌管。孔子弟子中先后在鲁任职的很多，如仲弓为季氏宰，子夏为莒父宰，子游为武城宰等，而子贡又以其富有的财力和其经商各地的经验而代诸侯们进行外交活动，成为有影响的“国际活动家”。于是，他在这些门徒的协助支持下，利用冉求在鲁国的作用，由鲁君出面过问，把孔子请回鲁国，其时孔子已 68 岁。孔子回到鲁国后，已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从此广招门徒，把推行仁政、恢复礼乐的希望寄托在教育、寄托在门徒身上，并致力于整理古代文献，汉以后历代相传的六经，

基本上都是经过孔子和他的后学不断整理补充而保存下来的。公元前 479 年，孔子逝世，享年 73 岁。

孔子一生凄惶奔波，但在其身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开创的儒学却自汉朝以来一直是官方的正统学说，受到提倡和保护。历代封建王朝都尊孔，并封给孔子种种称号。这些历代封号，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封赠以爵位，抬高孔子的政治身价，如汉平帝封孔子为公爵、褒成宣尼公，北周静帝封之为郕国公，唐武则天封之为隆道公，唐玄宗又晋升之为文宣王，宋真宗加谥为玄圣文宣王，不久改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又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另一种倾向则以为王公高爵不足以提高孔子声誉，而是以封号表彰其伟大的教化作用，如北魏孝文帝称孔子为文圣尼父，隋文帝尊为先师尼父，唐太宗尊为先圣，明世宗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世祖加称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又称至圣先师。后种倾向较前者较为合理，故在后世占了上风，统一为至圣先师的称号。当历代皇帝封禅泰山或出巡山东时，经过曲阜也要亲临孔庙拜谒，并经常派官员到曲阜致祭，以示尊崇。

孔子与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中，法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以及中国历史中的其他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由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学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学派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学派由商鞅、韩非创立，墨家学派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整理和解释；而所谓重新整理和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保存前代文化的典籍，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者说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从而其他学派的思想在无形当中被主流社会所排斥，淹没在历史的潮流当中。然而，在这其中也是存在着相当部分经典的值得人们借鉴的思想，若将其与儒家思想恰当结合，定会绽放出灿烂的思想火花。

谈及道家与儒家，人们不禁会想到道家的空灵缥缈理想化的思想与儒家的循礼而治的德政仁政思想存在的根本上的不协调。在这种不可调和中，又怎能整合为一体？

中国道家最早起源于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宗教意义上的崇拜，其后延伸出民主、科学以及浪漫主义的含义。道家所提出的“道”，转载了道家对于复杂的现实世界及精神世界的独特理解。道家提倡重视自然的法则以及宇宙万物的内在力量，因此，道派生出来的不仅仅是教条和行为的规范，同时也具有哲学、民族以及解释、方法论上的意义。道家学说是对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重要批判和补

充,因为道家提出的对自然与和谐的重视以及对过度的“人为”的反对是儒家学说所不具备的。道家学说对儒家学说的重要修正表现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反思;同时,道家学说的实践价值还在于帮助古代中国人更好地理解各种匪夷所思的自然现象。若从文化层面来看,道家文化是以“阴”为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女性化、感性、柔顺、耐受、放任以及神秘主义;而儒家文化则是以“阳”为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男性化、理性、权威以及控制。阴阳调和,孕育出独特的文化。

历史的经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道儒两家的结合并不是不能办到的:无为而治是中华管理智慧中的一块瑰宝。先秦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其著作《道德经》中首次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其后这一智慧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数次闪耀出它的璀璨光芒,尤以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及“开元、天宝盛世”为证。所谓“无为而治”并非简单的“无所作为”,确切地说,它的内在含义应该是“无为而无不为”。所谓“无为”仅仅是现象和手段,其真实的目的在于达到“无不为”的理想“治世”。如何实现这一对矛盾的统一,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有过绝妙的论述,同时也为我们描述了理想的“无为圣世”。道论是老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出发点。从道论出发,老子认为:人和宇宙万物皆源自道,蕴涵道的本质,依道而行,与道同在。“无为而治”以行道为根本,道是永久存在的、无形的……侯王若能遵守道,万物都会自然进化。为政治国就在于效法、奉行自然之道,这是老子政治观的核心和最高原则。如前所述,“无为”不是“没有作为”,而是指人们对待自然和客观现实,以及为政处事,必须依照自然发展规律办事,而不任意妄为。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这就是他的“无为而治”。他说:“无为而无不为矣。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因此,他所说的“无为”既是任其自然的意思,还有不妄为的含义。对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而言,无为而治意味着实施统治不应太具侵略性(或者称之为攻击性),而应当注重保持自然的固有特性;同时对于中国古代的劳动者来说,无为而治意味着在去除不恰当的高压政治的条件下,自然和人类社会能够达到最佳的和谐与繁荣状态(天之道,犹张弓者也,高者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道德经·七十九章》)。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曾经对无为而治有过探讨。《易经·无妄卦》中说过:“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据《易经》的理解,无妄是万物运行的最佳状态,处世应遵循自然规律行事,不应有过分的欲望。《易经》中天命的概念与道家的道有着不谋而合之处,《易经》也强调自然之性。《论语·子路》中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实行无为之治,贵在治人者的身体力行,才能行不言之教。治人者自身行为端正,即便不令,受治者也会积极响应;若治人者自身行为乖僻,即便三令五申也毫无意义。《荀子·解蔽》中说过:“道者,非天之

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所以道也……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荀子认为道并非虚无缥缈而充满神秘色彩的概念，虽无形，却于处处影响着世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所有人应遵循的准则。无论是世人处世抑或治人者治世，均不可随心所欲，唯个人意愿是行，也不可脱离客观实际勉强而为，而须顺应自然，因势利导，严格遵循事物之规律行事。《晏子春秋·内篇》中说过：“所求于下者，必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这里论述的也是对治人者的要求，若要求他人做到的，治人者应首先做到；而禁止他人所为之事，治人者切忌不可为之，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为之治正是需要这样的治人者身先士卒的模范行为作为无声的命令，使受治者心悦诚服，自治其身。治人者的身范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手段，对受治者的行动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这正是无为之治得以实施的前提之一。《管子·心术》中说过：“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则受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治窍也。”管仲是先秦时期治人者的典范，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处事之道，认为从认知到行为均不可存私心，若存私心，则视而不明，听而不聪，自然无法明察事物本性，故无法因物之性，因人之情行事。管仲在这里的描述是符合道家圣人学说的。《孙子兵法·计篇》中说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孙子认为，无为而治之道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若百姓与为政者受同样的道，教化自然兴起，百姓自然齐心。

如上所述，道家遵循自然之法、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儒家重礼文化中所缺乏的。在治国安内方面，无为而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方针，即便是比较理想化的，却也是实现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然而，仅仅如此又是不够的，在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出现衰微，“中国文化调失”现象严重，即中国的老文化崩溃，新文化又没有建成，中国处在文化真空的状态。这种“文化真空”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填补这个文化真空？——此时在中国扎根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毫无疑问是我们最佳的选择。所谓“礼崩乐坏，学绝道丧”，表现在中国人的个体生命上，就是常说的“十亿中国灵魂在飘荡”，中国人的心灵缺乏安顿，没有归宿；中国人的生命缺乏价值，没有意义。表现在中国人的社会道德方面，就是社会道德开始崩溃，人们已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来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表现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就是百年以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破四旧”，最后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儒学都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事实上，一方面我们并没有完全丢掉传统的文化精粹，另一方面我们学到的西方文化及其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其结果会使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中华民族就可能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表现在中

国政治上,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西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进而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这样,中国政治制度就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向西方文化歧出并变质,出现“以夷代夏”的局面,直接后果就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所暗示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即中国在以文明为单位划分国家属性的世界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

为实现其政治目标和社会理想,孔子进行了艰辛的思想探索,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基础观念,“和”就是保持多样化前提下的统一、和谐,“同”则是单一的、片面的、孤立的、走极端的强求一律。“礼”是孔子历史观的具象化,他认为礼乐是华夏族从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成果,礼乐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兴亡,礼乐的变易就是历史的变革,并总结出因(继承)、损(减损)、益(增益)三大礼乐文明发展演变的规律。他是站在很高的历史起点来把握西周礼乐制度及其本质及其精神的,所以主张在损益之后沿用(因)礼乐制度。“仁”是孔子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观念,是他本诸人性,针对现实,立足社会,以人为本提出的一个综合性很强,包容力很大的新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影响中国历史文化达两千余年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中庸”则是他总结了当时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思维成果而提出的对待事物的态度、处理事情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路。

因此,儒学作为这个古老民族和国家的国家文化与国家哲学,它的复兴是国家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在现在的国家思想中,也已得到愈加的重视,特别表现在外交的“和而不同”上,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和而不同”的新观点,就是: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用于观察处理国际关系和矛盾,无疑是一大创举,是我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亮点。

和与同是一对哲学范畴,最能体现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和政治智慧。春秋时期的齐国外交家晏婴这样解释其本义,他说:“和,如羹焉。”意思是说像厨师煮肉汤,把各种原料和作料加在一起,施以薪火,过则泄之,不及则济之,才能烹制出淳美大羹遗味。他又把和比作音乐,五声六律,刚柔清浊,疾之徐之,抑之扬之,才能奏出和谐动听的乐曲。同则相反,“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可见,和是丰富多样,同是千篇一律;和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同是相互重复,相互排斥;和是辩证法,同是形而上学。“和而不同”的思想,给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家们提供了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论,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

温家宝总理正是运用古人的智慧,提出国际社会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思想。“和而不同”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愿望和热切追求。他历数秦长城、

唐代丝绸之路和明代的郑和下南洋,说明中国人酷爱和平的文化性格;“和而不同”主张用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他深刻地指出: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和而不同”强调各国各民族共生共长、共同发展。这些观点和主张对于动荡的国际局势有很强的针对性。用“和而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就是要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允许多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声音,国家和民族无论穷富、大小、强弱、先进还是落后,都要相互尊重,共同发展。这些观点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要发展的大潮流,因而必然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

在当今世界上,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主流。冷战结束以后,人类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渴望更加强烈。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各国文化的联系更加密切、交往更加频繁。国际大家庭以及“地球村”的现代观念的觉醒,显示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信心。在这种大背景和现代意识的观照之下,中国文化的光彩熠熠生辉。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这些维系和调节家庭、国家与社会的传统美德凸显出不同凡响的现代性。面对单极与多极世界对立,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对国际争端和局部战火,面对文明的差异和冲突……“和而不同”为人们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平图景。因此,“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正如上述观点所示,以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根、民族之本,以道家文化(如“无为而治”)作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与补充,那么“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及“开元、天宝盛世”之情景将又会重现,中华文明的辉煌不只属于历史,更能创造现代的奇迹。

第二章 大学之道——人生的起点

导语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之书，原本是《小戴礼记》里面的一篇，相传此篇为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大学》之篇，经过北宋程颢、程颐的鼎力尊崇，后又经南宋朱熹（晦庵）作《大学章句》编辑，最终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在经历宋、元以后，《大学》就成为官定的学校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道德人文教育理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大学》之文，言简意赅，纲目明晰，教义深刻，名冠“四书”之首，是中国古代阐释道德文化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朱熹先生曾如此注《大学》：“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凡有志于修学道德，内具丰厚的德性，人格高尚的大丈夫方可称之为“大人”。

大学的真义，在于教人穷德道之理，以道德正心修己，明白人生的真谛，懂得天地人万物的自然规律，自觉地行做人之道、治世之道，此即是大学之道。

《大学》重视个体道德品质的塑造、关注个人修身的理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造就出一大批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勇挑重担的民族脊梁。批判地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吸收其精华，对塑造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健全人格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经文再现

《大学》（经文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译文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

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第一节 大学之道重明德

《大学》一书包括经文一章,传文十章。后面的《传》十章,都是对前面经文主要文段的阐释;而且是用引经据典的办法,去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主篇,实际上是从“大学之道”一直到“未知有也”这个区域之中。其他的《传》十章,都是对这一段经文的理解和展开,这是宋代以后朱熹所注章序的状态。

要读好《大学》这篇文章,首先要把最前面的原文,用道德文化精神正确地解读。它所阐释的,都是真正的道德的理论和方法。它把道德用在如何做人、如何理事、如何为民族和国家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展开和演绎阐释,这是每个道德修炼者必须阅读掌握,并且要认真实践的一部分。《大学》是如何做人和做好人的理论和方法,是如何做一个有德之人的理论指导。所以一定要认真地去读,真诚地实践它,并且上升到上乘境界之中,才能全面地去理解和掌握儒家的学说和思想。

综观整篇《大学》之文,可以看到它的语言非常精炼,意境异常深远,思路格外明晰,所含教义也非常深刻,言简意赅,纲目明晰。它之所以能名冠“四书”之首,并

不是枉得虚名,而是中国古代阐释道德文化教育理论的一篇至关重要的著作,它完全能够担负起教育理论的指导性重任。将它作为指导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教育理论,可以说当之无愧。但是我们要正确去进行解读、阐释,而不能站在唯我所用的、狭隘的、私欲的、利己的、小气的、抛经离典的立场上去解释。要站在大公的立场上用正确的观念去解读它,不要被历史所局限,不要被社会现象所左右。

今天,站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筑和谐社会,复兴民族、复兴道德文化这个立场上,重新审视它、认识它,也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精神食粮。

第二节 知纲达目修己身

从整篇《大学》不难看出,其中包含“三纲领”和“八条目”两大主要部分,并以之作为它的主干和精神要领。

《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至善,这三点就是《大学》的“三纲领”。

《大学》还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渐进和深化过程,成为实践德道的次第和步骤,被后世学者称之为《大学》的“八条目”,这些实践的次第也就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八条目”的中心环节,就是修身,修心炼己。

“三纲领”和“八条目”,都是强调道德修养,强调修心炼己,是治理每一个人的心,并拓展开来,达到德治社会的前提。修心炼己、实践道德的目的,是为了将修心炼己、实践道德所获得的德能,用于奉献社会,造福国家。而要达到以德治国,使天下太平安定,使民族复归于德治社会、道治社会,最起码要达到一种仁治社会的状态,每个人就必须修身,完成自我道德品德的修炼。

在宋朝以前,特别是汉、唐、宋时期,国家的管理者,包括文人,大多数都有一个半日静坐、半日应厅堂的习惯,保持了一个修身的良好习惯。他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方法,来达到清静自己心身,调适体内的道德状态,从而加强内在的、心身中的德性修养。通过静坐的办法来反思,实践“吾日三省吾身”,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为家,为乡,为国,都不离这个原则。但是,这种良好的习惯,到了元明以后,就全部被抛弃了。自那以后,修身被曲解,使人心中的私欲滋长,长期难以获得道德的规范。我们现在解读《大学》,一定要回到历史上,去看前人是如何把修身实践放在首位?在修心炼己的基础上,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家庭、对待自己事业的?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大学》真正的、深刻的内涵。